

本报记者袁汝婷、刘芳洲

铁水的温度，在1100℃至2300℃之间；电弧的温度，在6000℃至8000℃之间——这是与易冉近在咫尺的温度。

生于1982年的易冉是一名电焊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在中车株洲车辆有限公司从事重载高速铁路货车焊接。她是全国劳模，也是湖南省第一位女性“大国工匠”。

20多年间，易冉扎根于这份滚烫的事业，就像她手举焊枪时，胸膛里那颗火热的心。

电焊“花木兰”

第一次见到易冉，电焊技师杨卫东并没有上心。眼前的小姑娘面容姣好、清秀内向，想跟着他实习当学徒。他心想：“这么文弱，能当个合格的焊工也就算了。”

“焊工手里有团火，四季炙热无法躲。十个焊工九个黑，全身上下全是灰。”这是杨卫东和同事们的写照。

很快，他就发现易冉与众不同。绝大多数实习生会在师傅干活时跟着看，师傅休息时也跟着歇。可杨卫东干活时，易冉学得目不转睛，休息时，她就在一旁默默练习。几个月实习下来，她用掉了比旁人多得多的试板材料。

一年后，18岁的易冉从武昌技校毕业，正式进入株洲车辆厂（中车株洲车辆有限公司前身）。“你聪明、能吃苦，将来当个技师没问题。”杨卫东这样鼓励她。

彼时，一名焊工考上技师至少需要10年。杨卫东说，当时有6000余人的株洲车辆厂仅有一名电焊高级技师、两名技师。“当个技师”已是很高的期许。

对易冉而言，这份工作的确挑战艰巨——

在学校，她学的主要是手工焊条焊法，可工厂用的是半自动气体保护焊，这意味着许多技巧要从零开始学。

入职时正值盛夏，身材瘦小的她加入了底架转胎班。这是整个车间劳动强度最大、工作条件最艰苦的班组。送丝机加上焊丝有几十斤重，时常要提着它来回走。20公斤一盘的焊丝，每天要消耗一盘半、焊完125米，才达到工作量。

因为焊花飞溅，易冉不得不穿上两层厚厚的长袖工作服，捂出一身汗。入职头一天，她的脸就被高强度的电弧光灼伤了。“红得像一只煮熟的螃蟹，一碰就疼。”如今，她的额角仍有电弧光照射留下的褐色斑痕。

入职不久的一个凌晨，她下了夜班，因脸上满是灰尘，在厂门口等候的母亲，愣是没能认出她来。

越是艰苦，她却越是努力。一般来说，新入职焊工培训三个月才能顶岗，可她正式上岗仅用了半个月。

入职一个月，她获得了株洲市电焊技能大赛第三名；参加工作头三年，她囊括工厂年度比赛的全部冠军。23岁时，她成为了集团内部最年轻的电焊技师，26岁时，她成为湖南省当时最年轻的电焊高级技师。

“她比别人短得多的时间取得了许多成绩，是因为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努力。”2007年被评为“湖南省技能大师”的杨卫东，这样评价自己的徒弟。

尽管艰苦，易冉却没想过转行。“不是只有焊工辛苦，想要干得好，哪一行都会辛苦。”易冉云淡风轻地笑着，“每天都好忙，也根本没时间想转

8000℃的针·8000多个日夜·80000多辆铁路货车

记坚守技术攻关岗位23年的“电焊花木兰”易冉

行的事。”

2011年10月，29岁的易冉作为7名技能组选手之一，代表中国参加在德国吕内堡举行的“嘉克-LVM杯”国际焊接大赛。多国选手云集的赛场上，她是唯一的女选手。

易冉沉着细致的表现令组委会折服，为她专设唯一“特别奖”，并公开展示其参赛作品。她的照片被刊登在德文报纸上，人们称她为“中国的电焊花木兰”。

名片“攻关手”

重载高速铁路货车，是高铁“中国制造”的一张名片，代表着重载运输里的中国力量。易冉和她的同行们，是名片的锻造者之一。

能攻硬茬、善打硬仗、敢闯硬关——工作中，这是同事们对易冉的一致评价。

在易冉看来，自己的工作多数时候是“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而在这样轻描淡写的形容背后，实则是二十多年如一日地攻坚克难与执着求索——

2007年，易冉带领班组实施出口澳大利亚、用于矿石运输的“重载高速”第一台FMG敞车整车的试制。用户要求“焊缝缺陷为零”，这意味着手工操作要达到数控机械手精度。她夜以继日地从设备、参数、手法等多角度反复试验，研究出一套新焊法，焊缝质量全部达标。

2013年，易冉率队担负结构复杂的澳大利亚PN煤车试制攻关。由于车型结构特殊需要双面成型，可焊接时却无法实现反面清根（即清理焊缝根部的缺陷）。易冉反复思考、调整电流，采用小月牙形的摆动手法施焊，顺利攻克难题。

2016年，易冉再次攻下NX70A平车中梁“七字铁”焊缝开裂、质量缺陷居高不下的难题，使她所在的中梁



生于1982年的易冉是全国劳模，也是湖南省第一位女性“大国工匠”。23年间，易冉扎根于重载高速铁路货车焊接这份滚烫的事业，就像她手举焊枪时，胸膛里那颗火热的心。她的身上，因而烙下“勋章”——那是手肘、脚掌上星星点点的疤痕



▲2022年8月23日，易冉在中车株洲车辆有限公司车体一工区内进行焊接。
本报记者薛宇桐摄

班组一次交验合格率从39.73%提升到96.3%。她独创的“小摆快频”焊接操作法，入选中国中车绝招绝技。

“不服输，而且爱钻研，既苦干又巧干，所以易冉总能攻下别人攻不下

的‘山头’。”杨卫东说。

重载高速铁路货车在承载数十吨货物重量的同时，还要经受高速之下的高频振动，以及不同地域高寒、高温、高腐蚀等考验。

焊缝，往往存在于板材结构的拼

接、转角等位置，就像人体的关节。焊缝平整，则受力均匀、坚固耐用；如有沟槽气孔，就容易成为缺陷的“发源地”。

一列车辆的焊缝长度累计可达1000米，任何微小的瑕疵却都可能埋下隐患。在这个问题上，易冉是不折不扣的完美主义者。她的身上，因而烙下“勋章”——

那是手肘、脚掌上星星点点的疤痕。由于手举焊枪时往往手臂弯曲，飞溅的火花时而掉落在她的肘弯里，时而掉进鞋里，把鞋、袜子和皮肤粘连在一起，一脱就破了皮。

可是，为了不让焊缝因停弧而

李春明是易冉的学徒，“只要师父在厂里蹲下身子，举起焊枪，身边立马就能围上一圈人。一是因为她水平高，二是因为她有耐心，愿意给大家细细讲解。”李春明自豪地说。

2011年，为了攻关和培育人才，中车株洲公司在株洲市总工会支持下组建了易冉领衔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十余年来，易冉践行“名师带群徒”，工作室培养出电焊高级技师、技师和高级技工93人，其中有17人成为全国技术能手及中车技能专家。

尽管已是荣誉等身的工作室负责人，她却始终带头学习前沿技术——

2020年，中车株洲车辆有限公司全面启动“精益+数字化”智能制造技术升级，易冉的工作室再次“打头阵”，承担起培训焊接机器人技能“数字军”的任务。

由此，在自动化理论知识领域可谓“零基础”的她，开始学习操控机器人，甚至学起了编程。“键盘上几十个键，记功能就花了一两周。”易冉说，一些设备的功能目录里，光是子目录就有800余个，解决一个程序的卡壳有时就要两三天。

易冉还是一头扎进去，认认真真学了起来。

“每次机器人厂家给我们做培训，师父就是‘十万个为什么’。”湖南省劳模、电焊高级技师陈娜娜说，学习新技能时，易冉“永远是最爱提问的那一个”。她总是随身带笔记本，把问题和答案详细写下来，学会了，再对每一个向她提问的人倾囊相授。

“有一些员工觉得机器人操控太深奥，不愿意学，所以我更要带好头。”两年来，易冉的工作室已经培养出几批专业的焊接机器人、机械手操作工人。她相信，智能制造会让焊接的工作环境有改善，也让产品标准化的道路越走越宽。

易冉常常会想起多年前，她跟随中车代表团赴欧洲学习，在飞机上俯瞰银色机翼下的祖国山河，心潮澎湃，“我意识到，成为一名优秀的工匠，就可以走向世界、为国争光。”

她也常常觉得自己有着“生逢其时”的幸运。“因为有无数的默默无闻在岗位上耕耘的前辈和同行，才会有‘中国制造’；因为生在一个如此重视技能人才的时代，我们才能实现技能报国的理想。”

在一些职业院校里，她分享自己的故事，把理想的火种，播撒在孩子们心底——

“你们听过‘竹子定律’吗？竹笋破土的前4天只长了3厘米，从第5天开始每天长30厘米，六周就长到15米。其实在这之前，它的根已经在土壤里默默延伸了数百平方米，储备养分和能量。”易冉说，“别担心付出得不到回报。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

梦想“引路人”

中车株洲公司有一支女子电焊技师攻关队。易冉是这支队伍的第三任队长。

自古以来，在“工匠”行当里，有着“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戏言。在女子电焊技师攻关队第二任队长、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袁红君看来，易冉用实际行动打破了这种偏见。

袁红君记得，十余年前，在一批出口车辆的生产中，有一个圆形工件需要用到新的焊接工艺，从试验到投入批量生产，前后耗时一个多月，易冉投入了大量心血，几乎是通宵达旦钻研。“她终于摸索出办法，焊好了之后，立马就去帮班组里的每一位同事，教大家操作时毫无保留。”

电焊高级技师、中车技能专家

从外卖小哥到公益律师：一颗法律“种子”催生的人生转折

本报记者陈毓珊、霍丹彤、彭菁

一条被锦旗“包裹”的狭长走廊，通向了南昌市总工会法律援助中心的劳动争议调解对接工作室，数面锦旗上都写着陈文斌的名字。

今年，是他成为公益律师的第三年。此前，他还是一名外卖小哥，再之前，是药厂员工。

32岁那年，专业对口的他每天和药厂的生产设备打着交道。然而后来企业遭遇经营困难，被迫离职的他一边寻求法律援助追回补偿，一边想着解决一家人的“口粮”，怀揣“211”的毕业证送外卖，成了他不得已的选择。

“我知道自己不会送一辈子外卖。”即使遭遇命运突变，回忆起过往，陈文斌语调温和。果不其然，第二年，他成了一名公益律师。

播种

脱下穿了11年的工装，换上7年前婚礼上那件有些发旧的黑色西装，记者面前，公益律师陈文斌用力捏捏着手作一团的面包，腼腆地笑着，“这还是我结婚的衣服。”

2019年之前，陈文斌的人生平凡却顺遂。1987年，他出生在江西南昌市郊的一户农家，从小就是个乖孩子的他，一边帮衬着家里的农活，一

边不落学学习。21岁从南昌大学生物工程专业毕业，顺利进入了一家专业对口的药企；28岁结婚生子、贷款买房，一切按部就班。他自己也觉得，如果没有那次变故，人生也许就在这条单调而稳定的轨道上缓缓滑行。

4年前的深秋，或是陈文斌人生中的一段至暗时刻。他所在的药厂遭遇经营困难，被收购后迁了新址，每天骑电动车通勤，来回得花上近4个小时。“公司效益不好要裁员，又不想承担过多经济补偿，就拼命给我们排夜班，也不支付加班费，希望员工主动离职。”那时，陈文斌的大儿子四岁，小儿子还不到一岁。

怀大宝的时候，妻子李萍查出先兆流产症，陈文斌宁愿一人撑起四口之家，也不敢再让妻子劳累工作。“工作出了问题，小孩奶粉都要买不起了，那段时间每天都跟自己较着劲，头发掉个不停。”

他形容那时的自己像个机器人：每天6点多起床，到晚上9点半才能下班。回到家中，妻子早已睡去。他向公司讨要加班费，却屡遭拒绝，最终闹成僵局。

为了维权争取补偿金，陈文斌和几个同事却请不起付费律师。他们偶然在劳动仲裁院的墙上看到法律援助制度的介绍，免费的公益律师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

第一次与公益律师欧阳文华、李

星交谈后，陈文斌感受到的是震撼，“以前从没想到，法律可以如此有力地保护我们普通劳动者的权益，能在一个人最困难的时候，扶起他的人生。”此时，陈文斌的声调略有些提高，眼神里多了些坚定。

让两位律师没有想到的是，正因这一席谈话，眼前这个而立之年的小伙暗暗在心中埋下了一颗法律的“种子”。从公司离职后，他准备全力以赴投入到备考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如果一次考不过，就再考第二次。”他说。

有了这个想法后，陈文斌向自己的援助律师李星请教，他担心自己不是法学专业出身，不能参加考试。李星给了陈文斌肯定的答复：“相信一年之后我们可以做同事。”

灌溉

陈文斌的家门口有一个不起眼的暗门，里面堆着些杂物和孩子们的玩具，最高处架着的，是个已有些斑驳的蓝色外卖箱。陈文斌熟练地取下它架在电动车的脚踏板上，套上一件相同颜色的抓绒外套，轻松地往附近的菜场驶去。

“这衣服穿着挺舒服的，也没坏，平常居家穿穿。”穿戴一身外卖的装备出门，陈文斌并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在曾经的艰难时刻，给他庇护的

正是这份外卖小哥的工作。

那时，陈文斌每天早上7点多出门，赶在早餐需求的高峰时段，给附近两所大学的学生送餐，一直工作到中午电动车没电，每天能跑五六十公里。将就些午饭后，他先给电动车充电，再静下心来看书，有时是书店一处安静的角落，有时是便利店里的用餐小桌。他也爱看些法学讲解视频，最喜欢B站上罗翔老师的频道，李星律师也会辅导一些难懂的法条。就这样，沉浸在备考中的陈文斌，直到深夜11点才动身回家。

送外卖给陈文斌带来一天150块左右的收入，偶尔他还会找工地上200块一天的零工，养活全家。

回忆起这段“工读”生活，陈文斌反而觉得“每天充满了干劲儿”。唯有错题会给他带来挫败感，甚至在临近考试时，他还在担心自己考不过而浪费几百块钱的报名费。彼时妻子李萍也在准备专升本的考试，两人便约定，看谁先通过考试。

法条带给陈文斌的，也不是只有为难。他说，自己背法条的时候总是觉得特别亲切，觉得这些法条背后保护的是如自己一样的人群。

就在陈文斌全力备考的同时，他维权的案子也在积极地推动着。2020年4月，案件开庭审理，同年7月，陈文斌终于拿到了7.1万元的补偿金。

好事接踵而来。2021年1月8日，凌晨就守在电脑旁的陈文斌第一次感觉到时间的漫长。几个小时后，他终于刷出了考试成绩，108分的主观题及格线，他考了113分。此前，他就以185分通过了客观题的考试。陈文斌第一个给李星打了电话，“李律师，我们可以做同事了！”

发芽

为什么这么坚定地想要成为公益律师？陈文斌答道：“为了社会公平，让像当时的我一样请不起律师的、相对困难的群众的公平。”

陈文斌打心眼里尊重当初帮助自己的律师，也希望成为那样的人。2021年3月，陈文斌加入一家律师事务所，成为一名公益律师。

记得刚进律所第一天，同事们热情的称他“励志哥”。成为律师后，他既感到梦想实现的喜悦，也时常涌起因责任感带来的忐忑。

工作一年多来，陈文斌接触最多的，是清洁工、外卖员、工厂女工等为了生活拼命奔波的一线劳动者。他说，在他们身上，总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王雷（化名）是陈文斌的受援者之一。一天下班后，王雷突然被告知被解雇了。她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家人疾病缠身，而孩子的学费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王雷说：“那一刻

觉得天塌了。”但陈文斌的正直、真诚与耐心倾听化解了她的不安与脆弱。每次去办事，陈文斌总是会提前等候，还贴心地提醒她天气炎热，要带一瓶水。

“以前从没想到自己的心声能这样被倾听、被尊重。”王雷说，从法院出来的那一刻，她看到了希望。

或许是自己淋过雨，便想为他人撑把伞。陈文斌接手的很多案子，实实在在地帮助受援人拿到了足够渡过难关的补偿金。

“陈律师进步很快，他在办案中对当事人的耐心令我印象深刻。可能因为他也经历过那种阶段，所以尤为感同身受。”李星说。

但陈文斌却说，除了宝贵的同理心，扎实的专业能力至关重要。成为律师之后，他切身感受到了角色转变带来的思维方式的转变。

在陈文斌的讲述中，已找不到昔日的阴霾。他不擅长讲那些宏大的规划，只说计划要花3至5年的时间成为劳动领域的资深律师，独立办理劳动争议案件，为更多普通劳动者更好地服务。

坐在南昌市总工会专门为公益律师设立的工位上，陈文斌说，“我本身是法律援助制度的受益者，更应守住这座灯塔，照亮更多人。”